

辛亥革命十年间
时论选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辛亥革命十年间
时论选集

第二卷

上册

张枫 王忍之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第二卷

(上、下两册)

张 桢 王忍之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4.75 印张 809,000 字

1963年1月第1版 1978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书号 11002·295 定价(上下册) 4.30 元



那支之紀世捨三

第一號







國粹學報

號一第己巳年一第
日十二月正年一十三緒光

錄 目 號 本

本號目次

報國

第四年第
行書詞一月號

報 義 天

新世紀

LA TEMPOI NOVAM

第二卷序言

1905—1907年間，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運動進入了廣泛發展的新時期。

1905—1907年間，農民群眾反對清朝統治、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繼續發展。抗捐暴動、反教會鬥爭，此伏彼起，震撼着瓦解着反動統治的基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某些發展，資產階級的力量有所增強，它的活動比從前活躍了。1905年，在資產階級領導下掀起了相當廣泛的反對美帝國主義迫害排斥華工的群眾性運動。從沿海到內地，在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城市，紛紛舉行集會，抵制美國貨。以後，又展開了以收回鐵路修築權、礦山開采權為中心的向帝國主義者收回利權的運動，並且取得了一些成效。日俄戰爭中，俄國戰敗了；1905年，俄國爆發了革命。中國的資產階級用俄國的事實來證明，必須改變中國的專制統治，必須給予資產階級以政治地位。這些情況表明，資產階級正在加緊努力為自己的發展開辟道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清朝專制統治的鬥爭已經有了相當廣泛的社會基礎。在這樣的基地上，資產階級革命分子領導的革命運動，就迅速地高漲起來。中國革命同盟會的成立，是革命高潮的起點和標誌。

在二十世紀的最初幾年里，資產階級革命分子就進行了一系列的工作，為同盟會的成立作了準備。他們出版了許多宣傳革命的書刊，組織了一些革命團體，從事發動起義的活動。陶成章在“浙

案紀略”中說，由於革命者的宣傳活動，“甲辰(1904年)後，內地革命風潮大熾”。孫中山在“孫文學說”一書中回憶說，1905年，在歐洲留學的中國學生已經多數贊成革命。孫中山指出，這是因為這些留學生“皆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兩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但是，在同盟會成立之前，革命宣傳還缺乏共同的綱領；革命組織都是些局處一隅的小團體，它們分散地孤立地行動。要推進革命運動，就必需統一革命的目標，統一革命的力量，統一革命的行動。順應着這種要求，在孫中山的倡導下，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組織就聯合起來，組成了中國革命同盟會。

和以前的革命團體不同，同盟會是按照資產階級政黨的樣式，由十七個省的革命分子組成的全國性的組織。根據孫中山的倡議，同盟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作為自己的綱領。同盟會成立後表現出了蓬勃的革命朝氣，迅速地發展了組織，集中力量做了兩項工作：出版機關刊物“民報”；聯絡會黨和新軍發動多次起義。同盟會所做的工作把革命推向了高潮。

清政府的大臣端方，在一個奏摺中，對革命的發展作了這樣的描述，他寫道：“一二不逞之徒……恣其鼓簧，思以瀆皇室之尊嚴，偿叛逆之異志。加以多數少年，識短氣盛，既刺激于時局，憂憤失度，復偶涉西史，見百年來歐洲二三國之革命事業，誤認今世文明，謂皆由革命而來，不審利害，唯尚感情。故一聞逆黨煽動之言，忽中其毒而不覺，一唱百和，如飲狂泉。……逆賊孫文演說，環聽輒以數千，革命黨報發行購閱，數愈數萬。……近訪聞逆黨方結一秘密會，遍布支部于各省，到處游說運動，且刊印鼓吹革命之小冊子，或用歌謡，或用白話，沿門贈送，不計其數。入會之人，日以百計，踪迹詭秘，防不勝防。其設計最毒者，則專煽動軍營中人，且以其黨人投入軍隊。……奴才聞此，痛憤之余，繼以忧虑，竊以為今日中國，大患直在腹心，縱任之則潰決難收，芟夷之則全局糜爛。”端方的這

一个奏摺，典型地表明了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潮流面前，清朝統治者万分仇恨，惶恐不安。为了应付局势，在統治阶级内部也議論紛紛，要求制訂新的策略。

1905年起，清王朝的高級統治集团中間，如駐外使臣、督撫、尚書以及皇室亲貴，都有一些人主張“变更政体，实行立宪”，有的人还为此上了奏章。1905年底，清政府派五大臣赴欧美日本考察政治。1906年，五大臣回国，奏請“仿行宪政”。經過御前會議上的一番爭論之后，1906年9月，頒布了詔书，宣布“預備仿行宪政”，并規定从改革官制入手。同年，清政府还頒布了“实业賞爵草章”。1907年，清政府又下令准备召开带有議会性质的資政院和諮詢局。这些做法是为了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緒，誘惑拉攏資产阶级，削弱地方督撫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总之，是为了消弭革命，以維持处在風雨飄搖中的反动統治。

資产阶级改良派虽然不满意清政府在实行立宪的步驟上拖延时日，蹒跚而行，但是，他們以为，清朝統治者既然已經表示要立宪，那么，进行合法斗争的大門就打开了，从此以往，經過他們的“劝說”“要求”，就能够使清朝統治者步步退让，以至使政权的性质发生有利于資产阶级的改变。因此，他們一方面利用清政府的种种表示来宣傳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張，企图使人民离开革命的道路；一方面积极地組織团体，研究宪政，上书請願，催促清政府加快立宪的步伐，他們企图用这些办法来扩大自己的力量，为挤进政权作好准备。1906年，在上海成立了由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的改良派士紳組織的“預備立宪公会”。1907年，梁启超在日本东京組織了“政聞社”。这些組織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清朝統治者已經不能照旧統治下去了，資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在积极活动，力图按照自己的意志駕馭局势的变化，以便使局势的发展最有利于他們各自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在这

样的情形下，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間的斗争以更尖銳激烈的形式在更广的范围内展开了。1905—1907年間，革命刊物的头等重要的內容就是批駁改良派的政治主張，而改良派刊物的主要打击方向，则指向日益发展着的革命潮流。

二

1905—1907年間出版的革命刊物有“二十世紀之支那”、“醒獅”、“民报”、“复报”、“汉帜”、“云南”、“四川”等。“二十世紀之支那”是“民报”的前身，“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其他一些刊物和同盟会也有联系，刊物的創办人和撰稿人很多是同盟会會員。这些刊物在不同程度上宣傳了同盟会的革命主張。

“民报”是当时出版的革命刊物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刊物，是資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論坛。“民报”宣傳的基本思想是孙中山在“发刊詞”中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其具体内容就是同盟会綱領中所說的“驅除韃虜、恢复中华、創立民国、平均地权”。“民报”所宣傳的这个思想，是当时革命者在探求救国救民真理过程中得到的認識的概括。在1900年以后出版的革命书刊中，推翻清王朝的思想，建立民主国家的思想，改革經濟制度实行所謂“社会革命”的思想，都已經屢見不鮮了。把这些思想集中起来，制订出简单明确的革命綱領，是孙中山的功績。“民报”在和改良主义思想斗争中闡述和宣傳了这个革命綱領。

“民报”从各个方面論述了推翻清王朝的必要。有不少文章把清朝的反动統治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联系起来考察。它們指出：滿洲貴族为了維护其政治特权和經濟利益，对外将继续执行屈辱的卖国的政策，因此，在清王朝的統治下，中国就将继续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不可能走上富强的道路。“民报”证明說，唯一的出路是革命，革命的首要的根本任务是，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

和国。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建立以后，还要做些什么呢？在这里，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面临着他们的西方前辈所没有遇到过的情况和问题。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思想家深信，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完善、最美妙的制度，也是永世长存的制度。中国资产阶级举起革命旗帜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已经明显地尖锐地暴露出来，无产阶级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形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因而，向西方吸取革命思想的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向往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物质文明的同时，又在考虑如何“补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如何才能“预防”和“避免”社会主义革命了。

“民报”上发表的不少文章指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物质财富虽然迅速地增加了，可是享受这种进步成果的只是少数富豪，广大人民仍然过着困苦的生活；民主共和国虽然建立了，可是它实际上是“富人”专制，贫苦人民并没有摆脱“富人”的压迫。特别使当时革命者惊心动魄的，是中小资本家在托拉斯垄断组织的排挤并吞下迅速破产；是工人运动、社会主义革命风潮的蓬勃发展。出路在那里呢？他们翻译介绍各种各样的标榜社会主义的学说，其中有无政府主义，有国家社会主义，有社会改良主义，等等，想从中找到答案。他们也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可是，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他们本身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使他们不可能正确地理解，更不可能真正地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他们实际上只是想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但是，他们以为可以有一种比较“善良”的资本主义，结果就可以不出现垄断资产阶级，以免中小资本家陷于破产的困境。他们并不想反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只是想略为触动一下封建土地所有制。他们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并且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改革，以为只要做到了这一点，

就能够避免資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恶果，而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不会再发生了。这种思想，作为社会主义学說是空想的反动的，可是，由于它接触到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个在当时中国社会中的根本問題，因而在資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践中又具有革命的进步的作用。

“民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比較充分地闡述了这个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平均地权的綱領；其他革命刊物，就其主导方面来看，也在宣傳这个綱領中起了作用。如果分別地来看“民报”和其他革命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那就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全部地接受了这个綱領的思想，他們在解釋这个綱領时包含着不少混乱和分歧。

有的刊物，例如“汉帜”，有的人，例如章太炎、吳樾等，号召推翻清王朝，可是其出发点主要是反对民族压迫，实行所謂“民族复仇”、恢复汉族的統治地位。章太炎在“定复仇之是非”这篇文章中說：“今之种族革命，若人人期于顛复清廷而止，其利害存亡悉所不論，吾則頂礼膜拜于斯人矣。而縵学知书之士，縵識一名以上，皆汲汲于远謀，未有不以共和政体国家社会耿介于其心者。余虽踴躍，亦不能不随俗为言”。章太炎的这段話，反映了当时一部分革命者的認識。这类革命者，主要地只是具备了狹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他們虽然也随波逐流地談論民主共和，其实却以为“共和政体”未必就比“专制政体”更好一些。他們以为，推翻清王朝是革命的唯一目的，用章太炎的話來說：“排滿洲即排强种矣，排清主即排王权矣”（“定复仇之是非”）。

另一些革命者进了一步，具有了反对专制的民主主义思想。但是，他們中間也有不同。有的人說：“革命者，以去滿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汉族……不可以与滿洲人长此儕处，无论以立宪餌之也，即有共和极制，非与滿洲为群无从得之者，亦有舍置之而已”（“論滿洲虽欲立宪而不能”）。有的人說：“革命之中，有

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問題（按：指反对专制，建立民国）者，鄙人所主張，固重政治而輕民族。……鄙人之排滿也，非如倡复仇論者所云，仍為政治問題也”（“絕命書”）。

“民報”和其他革命刊物上發表的文章表明，真正贊成平均地權的革命者為數並不多，而且他們對於平均地權的解釋也不一致。有的主張由國家核定地價，以後地價和地租的增加部分歸國家所有；有的則主張廢除土地私有制。有的說，平均地權並不是“奪富人之田為己有”（‘民報’周年紀念大會上的演說）；有的說“豪富之田，不可不藉……奪其所有，以共之于民，使人人之田，均有定額，此則仁術之至大者也”（悲佃篇）。

上述情況的產生不是偶然的。同盟會會員以及受同盟會影響的革命者，有的是小資產階級分子，有的是資產階級分子，有的是地主階級中的反滿分子。這就規定了他們的認識水平參差不齊，不能達成完全的堅固的思想一致。這種情況的存在，預兆了在革命向前發展的時候，同盟會却陷於分裂和癱瘓，預兆了有些革命者在辛亥革命後，很快就離開了革命的隊伍。

在當時，革命派之間雖然有分歧，但是在必須依靠革命鬥爭來推翻清王朝這個最迫切的問題上，革命者的意見是一致的，因而他們出版的刊物的一個共同內容就是反對改良主義的幻想。

1905—1907年間出版的宣傳改良主義的刊物有“新民丛報”、“東方雜誌”、“中國新報”、“政論”等。這些刊物反對同盟會的綱領，力圖證明：不存在什麼民族壓迫；中國人民沒有能力建立民主的國家；如果實行平均地權，國家的“基石”就動搖了；如此等等。這些刊物的共同的一以貫之的中心思想，就是反對經過武裝起義，徹底摧毀清王朝。

在反對革命的大合唱中，這些刊物所唱的調子是各有不同的。“中國新報”上發表的楊度的文章說，清政府是沒有什麼力量的，根

本用不着动用武力，只要在“左右叱咤声中”就能“促政府之倒”（“‘中国新报’叙”）。“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则着重于把革命描绘成为极端恐怖的危险行为。他们说，革命必然会遭到旧势力的猛烈反抗，会引起“暴民”骚动，引起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结果只能是连年争战，流血成河，民不聊生，亡国灭种。最使康有为、梁启超这类人胆战心惊的是：如果发生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那么局势的发展就不是资产阶级所能控制的，人民会起来用革命暴力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在他们看来，这是犹如洪水猛兽一样可怕的。因此，他们三番五次地说：“民气犹火也，不善用之也可以自焚”，他们歪曲地援引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事例作为证明。或者散布不必依靠革命暴力，反动的清王朝就会自行垮台的幻想，麻痹群众的革命意志；或者诬蔑革命暴力，否认其正义性，这是当时改良主义者反革命本质的两种主要的表现形式。

革命，是这些刊物所反对的，那么它们开出来的药方是什么呢？这些刊物的主张随着形势的变化也有所变化。“东方杂志”1905年5月发表的文章还以为，民主共和也好，君主立宪也好，都不是出路，唯一的办法是“即专制之政教，而因以为功”（“利用中国之政教论”）。到了1906年初就不同了，这时发表的文章说，立宪势在必行了，只是要立宪必须先行普及教育（“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而1907年初则一反以往的论调说，不能等待教育普及后才立宪，只有立宪以后才能普及教育（“人民程度之解释”）。“新民丛报”以及继承“新民丛报”的“政论”也有相类似的情况。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主张由清王朝实行“开明专制”，以后逐渐提高调子，到成立“政闻社”、创办“政论”的时候，梁启超就主张“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了。形势比人强，随着革命的发展，清王朝伪立宪丑剧的揭幕，改良主义者像变色龙那样迅速地变换着自己的姿态，以免被远远地抛在后面。